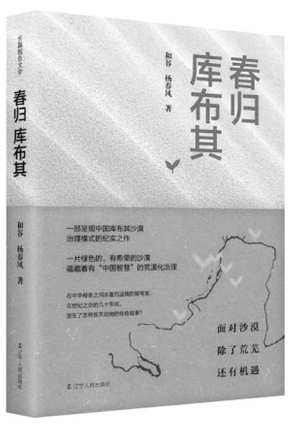
库布其沙漠治理的标本意义

刘 巍

提示 落实生态文明发展理念，难度最大的无疑是对已遭破坏的生态的修复，尤其是沙漠治理。但在中国沙患最严重的西北地区，当地政府和人民几十年来不懈努力，苦干加巧干，取得了治沙事业的惊人成效。而在这众多的治沙典型中，库布其沙漠是杰出代表。《春归库布其》以库布其治沙受到国际认可为开篇，全景式叙写黄河河套弓弦之地变沙害为沙利的艰辛历程和丰饶成果，形象地解读了库布其机制样本如何走向国内外的秘笈，为开拓人类生存空间、防治荒漠化和人与自然和谐的环境修复提供了国际视野的智慧与经验。



《春归库布其》，以纪实为骨骼脉络，以文学为血脉丰盈，既有文献资料的记载，又有个人体验的情感，既有严谨的史实撰述，又有精美的文字书写，既描摹生活、塑造人物，也试图探寻人类历史发展变革的规律及未来期许。二十万字，纵横捭阖，在时间上跨越了几代人，在空间上纵横了几万里。在纪实的基础上，讲述了一个比小说还要精彩的故事，作家驾驭题材的能力与生活本身的丰富性成就了纪实文学的优质与宏阔。

《春归库布其》以丰富的时空视角多方位、全角度地展现了历史与现实交织的巨幅画卷，追寻历史的本相以期对照现实的艰难与奋起。库布其沙漠是中国第七大沙漠，在河套平原黄河“几”字弯南岸，往北是阴山西段狼山地区，贫瘠而荒凉。“库布其”在蒙语中的意思是弓上的弦，因为它像一根挂在黄河上的弦。全书的第一章便以“弓弦”为题将历史的烟云与自然文化交错书写。及下，书中各章节依照传统小说章回体的样式记叙了“治沙”“筑路”“深耕”等事件，每一份“题记”就像一首诗，勾勒出当地人改造沙漠生态的全貌。阅读伊始，读者便为作者体大而虑周的文化遐思所震撼：鄂尔多斯游牧部落的扬鞭策马、鄂托克旗的凤凰山壁画、拓跋鲜卑的隔水相望、秦始皇设郡县修直道……“县志”“地方志”等文字记载中层出不穷的历史遗迹……汉民族老百姓口耳相传的“走西口”“闯关东”等民间故事，还有《孙子兵法》、人口迁移理论、钱学森的“钱氏沙产业理论”等引用，这本纪实文学囊括了治理沙漠乃至经营人生的诸多经典。作者对文化、生态等理论的运用俯仰可拾却并非点到即止，每一处引经据典都深入浅出，恰到好处地融入了对书中主要人物王文彪的性格塑造之中。例如，王文彪在面临民营企业如何承担社会责任的问题上，书中适时运用了钱学森的沙漠经济学：“在不毛之地搞农业生产，而且是大农业生产。这可以说是一项尖端技术。沙产业要充分利用沙漠戈壁上的日照和温差等有利条件，推广使用节水生产技术，搞知识密集型的现代化农业。”后来的事实证明，王文彪恰恰是在这一理论中获得灵感，建构了治沙的谋略，攻克一个个难关，取得一次次胜利，稳扎稳打地将沙漠种植成绿洲，与库布其人实现“共富”，先贤的哲思成为他进步的阶梯。《春归库布其》的写作有着深厚的文人传统，历史脉络与当下结合，在史实材料的收集、整理、提纯方面，作者显然下足了功夫。不论是汉族、蒙古族，俗人、喇嘛，每个库布其的生灵都有一段心酸的历史。作者以赤子之心的温润来塑造人物形象，作家和他笔下的人物一起，在贫瘠而质朴的荒漠上体悟生命的力道、科技的力度，让心灵驰骋于地脉天空，承担着社会、历史、文明的责任。

纪实文学的写作多沿着两条轨道走路，一条是人物塑造，一条是过程记述。《春归库布其》应该是双线并行，以小说手法记叙真实故事，状物抒情、意境营造以及真实人格的呈现交织圆融。在介绍了库布其的历史与自然之后，书中主要人物王文彪从漫卷着沙尘与饥馑的背景中粉墨登场，祖辈的困苦成为他改天换地、谋求发展的原动力。王文彪是吃着沙拌饭长大的温文尔雅又异常彪悍的汉子，他作为拓荒者的吃苦耐劳，作为工程师的创新与担当，还有作为儿子的孝顺，作为普通人的软弱，在书写中都被作者娓娓道来。中国老百姓讲求知识改变命运，王文彪也是如此，通过考学，他从农民当上了民办教师、到政府办公室秘书，可他不甘于此，他要让他的人生与沙漠一起焕发生机，他要与众乡亲共同奔向小康。在生活安稳不久，他便主动请缨，立志让盐海子走出泥潭，这无疑是为自己背负了一块巨大的山石，他从此便开始了西西弗斯式的苦行。

王文彪既是思想者，也是实践者。他以锐意进取的精神、踏实肯干的韧劲和超凡的毅力发展为万面鼓声中向涛头立的弄潮儿。他没有像老乡们悲观预想的那样成为盐海子开发以来最后一任可怜而悲壮的厂长，而是在老工人质疑不断的声音中从种树开始保住盐场，以科学技术为保障，凭着产销湖盐、芒硝矿、原碱，为盐场积累了第一桶金。盈利之后，王文彪积极配合政府的沙漠公路计划，带领自己的员工和当地农牧民穿越沙漠腹地死亡之海，修筑了一条通向外面世界的道路。由黄河锁边林到人进沙退的壮举，真正实现了以连绵的绿色屏障为大漠披上衣裳的人类梦想。正如王文彪经常说的：“任何事情如果不去做，永远是零。不能好高骛远，只要能凭着一双手种活一棵树，沙漠就多一点绿。”《春归库布其》是一部呈现内蒙古库布其沙漠治理的纪实之作，更写出了沙漠治理这一世界性的生态奇迹是如何在库布其人的手中实现跨越式发展的。

纪实文学中生活细节的真实、历史史实的翔实只是其成功的基础，作家怎样以生花之笔将散乱的砂石串成美丽的珍珠才见功底。《春归库布其》的作者和谷本就是散文家，散文追求的就是“主情”与“主智”的并行不悖。陕西是文学大省，以小说见长，而和谷的创作则多以散文和传记为主，他是一个“扛着锄头走在故园的土路上”的歌者。他的写作不是流于书斋笔端，而是沾泥土、冒热气、带露珠的。书中写沙漠之壮美时有这样的文字：

黄河如弓，大漠如弦。造物主所赐予的库布其沙漠的版图，富于英雄好汉与风流骑士格调的诗意。弓弦在手，以坚定的意志和强大的力量，作一个马背民族彪悍而优美的雕塑般的造型运作，便是胜利在握，光荣与梦想同在。想一想，又何尝不是一支巨大的绿色琴弦，由天、地、人共同触摸，弹奏出足以撼天地、泣鬼神的深情而悠扬的曲调，让万物生灵倾听。

阴山如黛，黄河远上白云间，鹰的翅膀上驮着一轮太阳。而那一支无比巨大的无形的时光之箭，又是如何穿越了漫长的历史帷幕？回首历史的来路，回溯这块土地上的人与自然的秘史，不由使人仰天长叹，思接千年。

几十年来，和谷始终承袭着他在1981年《人民文学》上发表《故乡柿子》时的温情，铅华洗净而初心不改。不论写作文体为何，只要艺术家热爱生命、热爱生活，他的文学艺术观就是向上向善的。《春归库布其》为中国沙漠治理立言，为世界了解中国打开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在国际科技界和文化界唱响中国声音，为人类生态环境修复提供了国际视域的中国智慧与经验。

（作者系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

那些聚合分离随蒲公英而去

徐 迅

我读俞胜的散文集《蒲公英的种子》，正是蒲公英开花的时节。就在离我家不远的奥林匹克公园里，一朵朵蒲公英像是刚被明媚的阳光唤醒，顶着黄色的花，睡眼惺忪却又义无反顾地与春风一起漫天飞舞……如此读俞胜的散文集，我突然觉得不仅是一次诗意的阅读，也是应景的阅读，是一次在春天里倾听蒲公英的歌唱。

在俞胜的笔下，“蒲公英的种子”首先就是一颗颗诗意的种子，这样的种子不是随风飘扬，而是深深地扎根在他的故乡，开着艺术的花，长着艺术的叶。他说，“那柳叶岂止是苍翠欲滴的，绿得连柳的上空都弥漫着一层烟似的云……”（《故乡的柳叶》），而茶叶，他就直接说是他故乡的一春柔情了。“小小的叶子绽放在你的水杯里，就有南方的云霞为你蒸蔚而来，就有南方女子的清香为你飘漾而来。”（《一春柔情》）……等等，俞胜情满故土，写到故乡的树叶，他的语言总显得异常的清新和灵动，那语言仿佛是树叶也经历了一次雨水的洗礼，水淋淋的，充满了一种浓郁、新鲜的意味。当然，他横生的才华不只是用来机械地采撷故乡的叶子，而是在故乡的树叶中，寻找着自己独特的发现和沉思。比如，看到故乡的秋叶，他发现“枝头是叶子的故乡，叶子是故乡的游子”，由此他认为人们常说的“树高千丈，落叶归根”就不一定准确，甚至不过是人们的一种奢望。寥寥数语，字里行间却流露着他对故乡，对于自然的一种挂牵，这种挂牵于他是百转千回的牵肠挂肚。

读俞胜的散文，我还觉得他的心灵非常敏感、冲动而又缜密。灵动的思想似乎经常与他眼里的山水结伴而来。这在他的《寂寞的百望山》一文中可见一斑。他在居住的附近，看到百望山上的积雪，立马上山，而通过百望山翠竹上的积雪，他感悟到了山的幽静，进而感悟到一座山“热闹的时候是真的，寂寞的时候也是真的”，体会到一座山的多重性格，最后，却又归于王国维先生所说的“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物，何者为我”……他的几篇写山水的文章，更是处处摇曳着陶渊明的“南山”的影子，他喜欢陶渊明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喜欢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南山——“说来也怪，普天下的山，被称为‘南山’的有许多座。不管是有名气的，还是没名气的。是山色秀美些的，还是山色平常些的。我只要一听是‘南山’，便觉得这山里流转着一种空灵，飘逸着一种闲适，就想到这山里来走走。”（《杭州南山结缘记》）

然而，生就是一粒蒲公英的种子，他也只能早早离开故乡，随风而去，说到底只是他心灵里一种偶然出现的梦影。很小的时候，随父亲学习《唐诗三百首》，那平平仄仄的东西虽然让他“变得容易凭花落泪，多情敏感起来”，但对文化那诗性的向望与追求却深深地刻进了他的骨子里，成就了他对父亲的无尽追念，也影响了他一生的追求。用作书名的《蒲公英的种子》是一篇情真意切的散文，每每读来，总让人泪水潸然……兄弟姐妹，至爱的一家在那饥饿的岁月就像是蒲公英一样，各奔东西。岁月赋予了他们的是艰辛，他们回报岁月的却依然是无法割舍的亲情。母亲说：“兄弟姐妹呀，就像蒲公英的种子，小时候大家圆圆满满地聚在一根茎上。大了时，风一吹就飘散到四方了。再想聚在一起可就不容易了。”这不容易，不是简单的物理上的距离，而是人们心灵的距离。是命运，是岁月，是人生最为至痛的部分。他娓娓道着一家人的聚合分离，文字里有说不尽的惆怅和辛酸。如此，俞胜的蒲公英“种子”不但是思想的种子，还是人性的种子，是蒲公英最为深沉的吟哦。

明代开海禁后华南经济开始崛起

本报记者 王云峰

提示 经济重心的南移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人们熟知的是，中国经济重心在东晋和南北朝时期开始由北向南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一带。事实上这种南移从未停止过，并与海上丝绸之路有着密切的关系。《丝绸之路全史》以崭新的视角揭示由中国起航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衰落和由西方海上强国开辟的近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对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海禁与有限的开放造成中国经济重心的又一次转移。

亦盗亦商活动不胜其扰，明朝实行海禁

《丝绸之路全史》以翔实的历史文献为基础，以中华文明的演变和东西方文明交汇为主线，从古至今对丝绸之路沿线以及相关的历史事实进行梳理，特别是少有著作提及的海上丝绸之路这部分，研究扎实，观点新颖。海上丝绸之路对中国历史的走向影响之大超乎想象。

明朝建立以来，一贯执行重农抑商政策，规定“片板不许入海”。但承平日久，海禁逐渐松弛，给葡萄牙人入侵提供了时机。

丝绸、瓷器和香料贸易的巨额利润吸引了葡萄牙人。1516年印度总督阿尔布奎克派遣安特拉德率领舰队从科钦出发，前往中国。他们于8月15日抵达珠江口，在东莞屯门、南头强行登陆，并盖房、设栅，企图武力强占屯门、南头。

广东当局闻报大惊，急派海道副使汪鋐亲督师船进剿，用火攻葡船。1521年夺回屯门，次年收复南头。葡萄牙人两次和中国交战失败后，仍不死心，继续在广东一带侵扰，海疆不靖。

因此，明政府下令严行海禁，贸易一概断绝，连“进贡”也严加限制。此外，朝廷还命令广东当局严守海疆，派水师日夜巡逻海上。于是包括葡萄牙在内的外国商船，只好离开广东，纷纷北上，驶往浙江、福建寻求贸易机会。

早在1517年，一个叫马斯卡林纳的葡商潜入漳州、宁波沿海一带搜集情报。他发觉浙闽海防疏漏，虽有军事设施，形同虚设。最让马斯卡林纳兴奋的是，当地商人欢迎外商来贸易，尤其那些富商大贾，朝中都有强硬的后台，地方官吏奈何不得他们。马斯卡林纳经过试探性贸易，效果极佳，所携货物销售一空，然后满载中国货物返回马六甲，获利之巨，出乎意料。

第二次马斯卡林纳又从马六甲运来满船货物，到宁波双屿港进行贸易。很快，货物全部脱手。马斯卡林纳还和当地海盗李光头、许栋结为兄弟，在他们的庇护下在双屿站稳了脚跟。后来从屯门、茜草湾败下来的葡萄牙人投奔双屿，其他葡商闻讯也赶来做生意。

嘉靖二十七年夏四月（1548年5月），明军由海门进入双屿，与葡人、倭寇在九山洋相遇，经过一场激烈的海战，大获全胜。同年6月，从双屿港逃出的葡人和倭寇，纷纷南窜，集中在他们的据点——韶安走马溪。嘉靖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1549年4月19日），明军南下福建，在走马溪与敌一战，又获大捷。

自从双屿、走马溪两次中葡战争之后，朝廷中严禁派得势，重申严行海禁。

明朝海禁让澳门成为近代海上丝绸之路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

历史总是很有趣，明朝的海禁政策竟意外成就了澳门。

1552年，一艘葡萄牙商船来到广东外海，在浪白澳抛锚停泊。该船搭乘葡王若昂三世任命的特使苏萨，奉命来中国，试探中国当局的态度。最后苏萨以贿赂手段买通了广东海道副使汪柏，允许葡萄牙人到省城贸易；葡萄牙人则每年交付1000两银子，并按章纳税。

他们私订的密约朝廷根本不知道，不过葡萄牙人还是依靠地方官庇护在澳门定居下来。史书记载：“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夷舶趋濠镜者，托言舟触风涛缝裂，水湿贡物，愿借地晾晒，海道副使汪柏徇贿许之。”

故澳门开埠，一般都认为是在1553年。 葡萄牙人以欺骗行贿手段在澳门取得晾晒水渍贡物的地方，就是在今澳门南湾一带。当时南湾是个渔村，及至葡萄牙人来此以后，因为外商都来此贸易，这里便迅速发展起来。

从1553年到1641年的88年中，澳门贸易空前发展，迅速从一个小港口变为一个拥有十余万人口的海港城市。

由于当时中国实行海禁，沿海港口均被封闭，东西方各类人士往来中国，都要经过或留居澳门。于是西方的商人、传教士、冒险家、学者纷至沓来，澳门成了近代海上丝绸之路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

澳门港的兴起，标志着由中国起航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已经衰落，代之而起的是由西方海上强国葡萄牙开辟的，逆方向的近代海上丝绸之路。它预兆着新兴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即将诞生，而中国专制的封建帝国正在没落。

明隆庆开海禁让华南成为最富有生机的地区

明朝海禁虽严，但是时代潮流不可阻挡。由于明末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发展，沿海人民特别是海商迫切要求开放海禁。于是有隆庆元年（1567年）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上疏“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之举。这一年嘉靖帝死，隆庆帝即位，改革家张居正入阁当家，隆庆帝立即准奏。

正如后任福建巡抚许孚远所说：“隆庆初年，前任巡抚涂泽民鉴前辙，为因势利导之举，请开市舶。易私贩而为公贩，议止通东西二洋，不得（通）日本倭国。亦禁不得以硝黄、铜铁违禁之物夹带出海，奉旨允许。几三十载，幸大盗不作，而海宇宴如。”

隆庆开放的当年，正式开放福建漳州的月港，在此设置海澄县，并建立督饷馆，专门管理私人海外贸易，月港顿时繁荣起来。不仅开发了新的月港，也带动了老港（广州和澳门）的兴盛。还有如安平、梅岭和台湾的鸡笼（基隆），也呈现一派繁荣景象。

明朝国库收入因此大增。万历四年（1576年）月港税收万金，万历十一年（1583年）增至二万余，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再增至二万九千余。

据统计，隆庆开放后的七八十年间，通过各种渠道从吕宋、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约1亿两左右，相当于明嘉靖年间44年和万历年间25年的白银赋税收入。

关于隆庆开放的历史意义，有学者指出：16世纪后期的隆庆开放是中国的一次历史性机遇，华南最先利用了这个机遇，和海外市场联系在一起，所以华南经济在此后表现得最富有生机。本书作者甚至大胆指出，隆庆开放是中国经济重心由长江流域向华南转移的开始。

■书单

陪伴在离别的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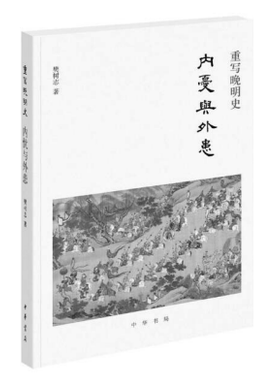
最近，综艺节目《忘不了餐厅》将我们的目光引向了一个特殊的老人群体，他们都患有同一种病症“阿尔茨海默病”，而人们更加熟知它的另外一个名字——“老年痴呆症”。《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报告》显示，中国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已超过千万，居世界首位，并且每年以30万以上的新发病例快速增长。中国每10位老人中就有1位认知障碍患者，其中超过半数患有阿尔茨海默病；每隔3秒钟，世界上就会多一个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平均每天有超过1000位老人会走失。本期的主打书单——《生别离：陪伴母亲日记》就是一个有着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家庭的真实写照，它的真实在于作者聂晓华将15年间陪伴患病母亲的日记整理成这本书，是她目睹母亲生命逐渐逝去的真实记录和情感剖析。在老龄化问题加剧的背景下，聂晓华的记述别具意义。甘苦中的隐忍，忙碌中的焦虑，真切而感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悲情”故事。它如此翔实地描述了一个患者的病程以及家属的应对。聂晓华提醒：遗忘只是阿尔茨海默病的第一步。

《内忧与外患》则描述了明朝万历初期，大明王朝在全球化贸易的浪潮中以绝对优势居于全球贸易中心，到清军入关后的王朝覆灭全过程，在大量细节史料的基础上，重现了晚明那段历史。

读《天生恶魔?》，是一次与人类最深恶意的近距离接触。恶，是天生的还是后天习得的？大屠杀的主谋，生来就是精神变态，还是说，他们的心理状态跟你我并无不同？因为种种原因，书中珍贵的资料尘封了70多年，作者迪姆斯代尔博士运用现代心理学和生理学的知识重新解读当年的记录，试图一举解开恶意的本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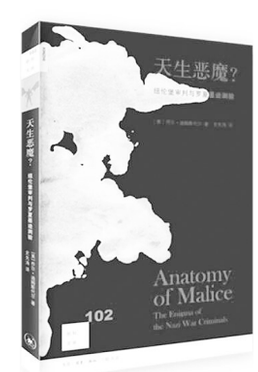
《生别离》

本书是聂晓华15年间陪伴患了阿尔茨海默病的母亲的日记。作者的母亲于2001年被诊断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俗称“老年痴呆症”。母亲的病情从开始健忘，发展到不断失去行走、进食、意识等能力，最终变成植物人，身体煎熬，意识远离。作为女儿的作者陪伴在侧，目睹母亲生命渐渐逝去的过程，为了从无助的绝望中挣脱出来，她以日记的形式零零散散、坚持记录了15年。日记中，除了客观记录病情发生、发展以及症状、应对，也充满了对生命的思索和对亲情的感怀。



《内忧与外患》

樊树志新作。内忧与外患，是晚明王朝面临的一个生死难题。在这个两难之境间，朝廷的急于求治却遇到了大臣们的相互倾轧。边关沦陷，中原土崩，大明王朝在朝臣不断的党争和倾轧中“气数”殆尽。作者站在全球史的角度聚焦晚明王朝，史识、史见与历史新知交融笔下；在遍阅晚明各种史料的基础上，由朝廷间的日常细节建构晚明大历史。



《天生恶魔?》

二战后，两位才华横溢的心理医生凯利和吉尔伯特得到了一个罕见的机会，获准和纽伦堡战犯共处一室。他们使用了当时的尖端技术罗夏墨迹测验，分析几名战犯大脑的认知结构。如此近距离与恶意接触，观察非常不容易。巨大的压力破坏了凯利和吉尔伯特的合作，激起了二人之间的分歧，导致了阴谋、诉讼和指责的结局。不过，他们的发现和争吵理顺了我们的思路，框定了如今剖析恶意的方式。